

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研究

历史与现实

◎ 何俊芳

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研究

历史与现实

H004.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学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研究： 历史与现实

何俊芳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寒 木

封面设计：赵秀琴

责任印制：陈立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研究：历史与现实/何俊芳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9
ISBN 7-81056-166-9

I. 中… II. 何… III. ①汉语-语言教学：少数民族教育-研究②少数民族-民族语-语言教学-研究 IV. H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4489 号

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研究： 历史与现实

何俊芳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白石桥路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中央民族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7.125 印张 190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01—1000 册

ISBN 7-81056-166-9/H·20

定价：12.00 元

序

科学研究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是始于共时描写，尔后逐渐推向历史研究。在共时描写中，一般是从局部描写到较大范围的综合描写。我国少数民族的双语研究也是如此。双语现象自古有之，是所有民族都不同程度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但人们直到进入近代社会，才开始思考、研究双语问题，才开始对双语现象进行理论性的探索。我国少数民族的双语研究始于本世纪六十年代，兴起于八十年代，但综观这几十年的双语研究，主要是对双语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归类、描写，发表了为数可观的双语调查报告。在这当中，共时研究的多，历时研究的少；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研究的多，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综合研究的少。何俊芳博士的《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研究：历史与现实》是一部综合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双语现状及历史演变的专著，既有共时的综合比较研究，又有历史演变的分析，从现状追述历史，从历史解释现状，融成一部古今双语发展的立体框架。这在我国少数民族双语研究中尚未有过，应该说它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和价值。

这部书的理论价值在于它为我国建立“双语学”学科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构思。在我国，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的双语发展速度很快，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这就要求我国的双语研究能够提高到学科——“双语学”的高度，为其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际指导。我们知道，一个新学科的出现，都有其独立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双语研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不例

外。在研究内容上，该书从社会、民族的角度全面剖析了本族语和兼用语的关系，研究了民族现实的语言活动、两种语言的使用状况以及与语言使用有关的语言功能问题，强调了少数民族在对待本族语和第二语言上的态度、观念等，把两种语言的关系放到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去考察，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认识双语关系。书中还重视研究我国的语言政策，从我国双语的发展规律阐述语言政策的合理性，从我国语言文字应用的需要论证推广双语的必要性。它不仅重视现实研究，而且还重视历史研究，艰苦地探索双语的起源和发展规律，对古今双语的变化进行描绘，使现实与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做到古今贯通，一脉相承。在研究方法上，该书使用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把语言学与社会学、民族学、民族理论与政策等学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既考虑到语言，又考虑到社会，从语言到社会，从社会到语言，从已形成的语言现象中找出影响双语发展的各种因素。作者所用的资料，有许多是本人通过调查问卷和个别访谈等获得的，并依此进行了定量、定性分析。在我国，双语学的建立目前还处于起始阶段，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完善还要经过长期的摸索过程，其发展既取决于双语教育发展的状况，又依赖于各相关学科的进展水平。该书所蕴含的有关双语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必定能为双语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养料。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重视现实，为认识现实状况、解决现实问题而展现了宏伟的画面。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从很早起，生活在我国境内的不同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已不同程度地兼用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语言，这就必然存在双语现象。双语的存在和发展，是我国各民族语言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息息相关的。特别是进入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双语问题直接关系到各民族文化教育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该书出于如何解决好少数民族双语问题的目的，满腔热情地对我国少数民族的双语现状

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不回避问题,不回避矛盾,而是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解决的意见(如民族地区局部出现的语言转用现象、某些杂居区民族语功能有所削弱等)。从漫长的双语历史中寻找形成和制约今日双语现状的历史因素,最后提出如何正确解决我国少数民族双语的对策意见。书中对双语现状及历史的分析以及解决双语问题的对策意见,对制订我国的双语政策以及如何做好双语工作都是很有价值的,对民族语文工作者和民族教育工作者会有许多帮助。

本书的特点之二是信息量较大。书中既有现今双语状况的资料,又有历史上不同时期与双语有关的民族关系、语言关系以及语文政策的资料。虽然我国历史文献上记载的与双语有关的资料很少,但作者还是尽力去寻找并尽可能收录于书中。除了收录直接反映双语历史的文字资料外,还注意收集能够间接反映双语状况的有关社会、文化等资料,并从中间接地获取不同历史时期双语特点的蛛丝马迹。作者把这些分散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资料汇集在一起,对于研究我国双语的历史是很有价值的。同时作者还引用了大量的各种有关反映 80~90 年代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状况的资料,通过这些资料,使我们能够了解到我国少数民族之间双语发展不平衡的具体特点以及每一个民族使用本族语的情况和语言转用情况等。这就使我们对我国少数民族双语发展的基本脉络和现实语言状况有了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本书的特点之三是微观和宏观相结合。书中既有微观的分析,又有宏观的综述。在微观上对我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双语特点和制约双语发展的各种因素及影响个体双语水平的因素等进行了分析。在这些微观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又从宏观角度对我国少数民族双语发展的整个趋向、国家的双语文政策等进行了综述。双语现象既是人们的个别行为,又是一个民族、国家的集体行为。它既受微观因素(如个体的年龄、性别、家庭状况、教育水平等)的影响,又

受宏观因素（民族关系、语言政策等）的制约。如果不从微观、宏观两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就难以认清其本质特征。该书对我国少数民族的双语问题在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上做了一些新的探索。

本书的特点之四是从实际中总结理论，有几分事实说几分话。如上所述，我国双语研究的历史比较短，特别是双语理论研究还处于初步建立阶段，而建立系统的双语理论则是双语研究的必然趋势。我国双语理论的建立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借鉴国外的理论是必要的，但不能套用，只能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我国自己特色的双语理论。该书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如关于母语概念、新时期双语发展的特点、有关双语学的理论与方法等，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全书的写作风格虽然是朴素的，但有一定的深度。

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的双语问题十分复杂，表现在类型多样、发展不平衡、制约的因素各异等各个方面，因而要摸准不同类型的双语特点以及提出切合实际的对策意见确非易事，这就需靠集体的力量做大量的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工作。因此，这部著作中存在的一些粗细不匀、顾此失彼甚至有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推敲，则完全是难免的。即便如此，这种垦荒式的集成对学科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也是需要有人专心去做的。

何俊芳博士1987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从事民族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91年公派赴莫斯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攻双语研究。在前苏联的4年多时间，她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双语问题，写出了题为《20世纪80至90年代卡尔梅克族的双语问题》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1996年回国后来中央民族大学随我做博士后研究工作，与我一起多次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双语，并写出了数篇双语论文。她具有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视野比较开阔，能通过不同学科的

结合来分析、观察双语现象。她还善于从各个方面收集资料，对客体进行个案调查，书中许多材料都是由她亲自调查和统计的。目前，我国正需要这样的双语研究人才。可以预计，今后她在双语研究领域里将会继续取得更大的成绩。我衷心希望她在中国双语学的建设上不断深化，成为过得硬的专门人才。

是为序。

戴庆厦

1998年1月30日

于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学院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我国少数民族双语发展的历史回顾	(3)
第一节 早期社会的双语	(3)
第二节 夏商周时期的双语	(7)
一、多民族分布局面的形成为双语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8)
二、民族融合过程是从单语经过双语向新的单语发展的过程	(13)
第三节 秦汉至明清时期的双语	(27)
一、“民族语·汉语”双语发展的主要表现	(29)
二、双语的特点及其成因	(57)
第四节 民国时期的双语	(65)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少数民族双语的发展	(70)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至 70 年代末双语的发展	(70)
一、制订双语政策	(70)
二、开始实行双语教学	(71)
三、发展双语新闻出版广播事业	(82)
第二节 新时期以来双语的大发展	(88)
一、新时期双语政策的进一步完善	(88)
二、新时期我国的语言状况	(91)
三、我国民族地区的双语分类	(95)
四、新时期我国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实验	(107)

五、新时期双语的特点及其成因·····	(120)
第三章 影响我国少数民族双语发展的因素分析·····	(133)
第一节 概述·····	(133)
第二节 国家因素对双语的影响·····	(135)
一、民族政策和语言政策·····	(135)
二、民族关系·····	(136)
第三节 民族因素对双语的影响·····	(137)
一、人口数量·····	(137)
二、人口分布特点·····	(138)
三、经济形态·····	(140)
四、教育水平·····	(141)
五、使用文字状况·····	(145)
六、婚姻状况·····	(145)
七、语言观念·····	(150)
第四节 影响个体双语的因素·····	(152)
第四章 我国少数民族双语的发展趋势及其对策·····	(160)
第一节 双语发展的基本趋势·····	(160)
一、双语人数量不断增多、质量不断提高·····	(160)
二、双语观念不断更新·····	(163)
三、双语的不平衡性将长期存在·····	(166)
第二节 有关双语的几个理论问题·····	(167)
一、怎样估计双语条件下民族语文的作用·····	(167)
二、怎样认识双语条件下的语言转用·····	(174)
三、跨境民族的双语发展问题·····	(177)
四、涉及双语的几个概念·····	(180)
第三节 对策·····	(194)
一、坚持使用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字的基本原则·····	(195)
二、重视双语的发展·····	(195)

三、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	(199)
四、切实保障双语发展的法规政策能够落实到实处	(200)
五、加强双语理论、方法研究，建立双语学学科	(201)
结 论	(207)
参考文献	(209)
后 记	(213)

引 言

当前的世界,随着各国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不断加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双语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涉及语言、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的大问题。而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双语现象早已存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对第二语言需求的增加,双语问题也随之突出出来,并已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解决好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问题,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因而,加强我国少数民族双语问题的研究,了解和掌握其发展演变的规律,认识新时期双语发展变化的特点,使其更好地为我国民族地区当前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已迫在眉睫。正是出于这种需要,我选择了这一研究课题。

自本世纪 80 年代双语研究在我国兴起以来,我国的专家、学者在双语研究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发表了一定数量的双语研究调查报告和论著。但综观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是对我国少数民族的双语现状进行了分析、归类、描写,其中共时研究的多,历时研究的少;分民族、分地区研究的多,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进行综合研究的少。这种不平衡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双语研究水平的提高。因为,一则我国双语的发展是连续性的,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的,所以不能割断历史,而要用历史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来研究双语。再则,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双语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双语现象进行综合研究,则有利于把双语研究推向新的深度和广度。总之,既重视双语的共时研究和个别研究,又重视其历时研究和综合研究,才能真正认识我国双语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性质,也才能提出正确的对策意见。

本文试图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探索我国双语现状的特点和历史发展规律，包括历史上双语是如何产生和演变的、现时双语的特点以及制约双语发展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探索新时期以来双语发展的规律及应采取什么对策。重点在于对客观事实的描写，同时也对某些重要的理论及概念问题做些必要的探讨。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对双语现象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研究。在研究中把双语现象看成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从不同因素的相互制约中探讨双语的结构特点和变化趋势。如：把语言的使用问题放在整个社会中去考察，紧紧地与民族关系、民族分布特点、婚姻状况、语言观念等结合在一起。在研究双语的发展历史时尽可能从文献中挖掘出有用的资料，直接和间接地考证双语发展的脉络。在对现时双语的研究中，使用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方法，进行定量、定性分析等。

希望这本小书有助于人们认识我国的双语现象，能对今日蓬勃发展起来的双语教育和双语研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还希望能对制订我国的民族教育政策和双语政策提供有用的参考。

第一章 我国少数民族双语发展的历史回顾

双语现象自古有之。自有人类以来,不同氏族、部落、部族、民族之间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必然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联系和交流,也就必然会出现语言兼用(双语)现象。这就是说,双语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尽管双语现象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不同群体的人们相互交往服务,但它的形成和发展、存在的形式和规模,都会受到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有所不同,因而它所起的社会作用也不尽相同。只有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当人们的社会生活更多地依赖于不同民族的相互交流和互通有无时,双语现象才真正具有了普遍性,也才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价值。但是,现代社会的双语现象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是人类社会长期积累发展的结果。不同历史时期的双语现象相互紧密衔接,不能彼此截然分开。因此,为了正确认识、了解双语与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必要对它的发展历史进行一番考察。

第一节 早期社会的双语

对语言起源和早期语言的状况,许多学者曾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假设和描写,但是这些都是根据间接资料推理的,所以至今我们还没有任何有关人类社会初期阶段语言状况的直接资料。但是,毫无疑问,语言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形成的,它产生于人类的最初发展阶段,是在人类的劳动实践中产生的。恩格斯曾经根据各种人文资料做过推想,早在人类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当原始人还

居住在自己最初的发祥地，即住在热带或亚热带森林中时就产生了清晰的语言，当然，他也指出，没有关于这一点的直接证据^①

根据考古资料，早在几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国境内就有不同人群活动的足迹。如属于猿人阶段（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元谋人、陨县人、陨西县人、蓝田人、北京人、南召人、歙县人和大荔人等；属于古人阶段（旧石器时代中期）亦即 20 万年至几万年以前的，有广东的马坝人、湖北省长阳人、山西省许家窑人及丁村人、贵州省水城人及桐梓人和云南省西畴人等；我国发现的人类化石属于新人（或智人）阶段（旧石器时代晚期）亦即二、三万年至一万年的，有江苏省泗洪人、山东省新泰人、北京市山顶洞人、山西省峙峪人、内蒙古河套人及扎赉诺尔人、黑龙江省哈尔滨人、吉林省安图人、广西省柳江人、广东省阳春人及封开人、台湾省左旗人、四川省资阳人、云南省丽江人、贵州省兴义人、浙江省建德人等等。

再摊开我国新石器时代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各种考古文化分布图，可以看到它与有文献记载以来的我国各民族的分布十分相近。就是说，有史料记载的民族分布与新石器时代的区系文化大致相吻合。这说明我国多民族的分布格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大体确定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关系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产生了。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各种考古文化与民族等同起来，但这些考古文化却反映着民族的一些特征。如我国每一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都有自己的分布区域，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在共同区域生活和具有共同经济文化特点的人们，他们所使用的作为人们交往工具的语言也一定具有共同性。因此，可以说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或某种范围内反映了民族的特征，表现了不同民族的存在，而且也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从我国新石器时代各种文化的特征和分布可以看出，在黄河中下游是华夏族形成和发展的地区；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是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18 页，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来被称为“蛮”、“南蛮”、“越”、“百越”等民族集团的居住区；在后来形成的长城以北地区，则是被称为“狄”、“北狄”的众游牧民族；而在中原地区的东方、东北方和西方，就是后来的“东夷”和“西戎”了。

原始社会最早期的社会组织形式是氏族、部落。在氏族组织发展的过程中，氏族由于自然增殖，人口愈来愈多，于是不断分裂。不同的氏族组成同一部落，每个部落使用相同的语言。但是，为了更多地获取生活资料，部落从具有较优越条件的某个中心地带向周围的区域扩展，就在距离原居住地比较远的地方发展起来，于是产生了不同的部落，不同部落之间由于居住地区的长期分隔，必然导致语言上的差异，乃至产生不同的语言。这种发展趋势早已被人类学家摩尔根发现的印第安人原始部落分化的过程所证明。如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分裂的过程持续了几千年，仅在北美洲就形成了四十种语言，每一种语言又分为若干种方言，方言的数目与部落的数目大致相等^①。我国早期民族语言发展的基本轮廓也会如此。当然，不同部落之间不是完全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还需要交换、交流，特别是过去有过血缘关系的部落，更是与其母亲部落经常保持联系。此外，各部落之间经常还会出现掠夺、兼并和战争。为了对抗的需要，某些部落还会结成临时的部落联盟。部落之间的这种社会关系，决定了一个部落（或部落中的某些人）要兼用另一部落的语言（或方言）。

如在原始公社母系氏族制度时期，不仅在氏族部落内部、男女集团之间有劳动分工，就是在氏族和氏族之间、部落和部落之间也产生了初步的劳动分工，具有不同条件的各个集团生产出自己特有而与其他集团所无的物品，这就导致不同集团之间以物易物交换的开端。到了原始公社父系氏族制度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便开始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从而氏族

^① 林耀华主编：《原始社会史》，第279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部落之间、家族之间以至不同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日益发展起来。如在远离海滨的青海西宁、乐都等地相继发现了随葬的贝壳；大汶口文化遗址中，较普遍地发现了一些非本地出产的物品，如玉石、象牙及其制品和产于长江流域的鳄类骨板等。这些都是由交换而来的。河南偃师滑城龙山文化遗址中，出现大汶口文化中富有特征的陶器，足见大汶口文化居民与外地氏族部落之间存在着交换关系^①。

再如，根据考古资料，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各族体之间不仅存在着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甚至还存在着相互混合和融合。例如，沿长城一线存在的既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成分，又大量存在细石器，这就是中原农业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互相影响和互相渗透的结果。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和徐淮一带的青莲岗文化，后来都发展为龙山文化，既表现着民族间的融合关系，也表现着民族发展的过程。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江南青莲岗文化，后来都发展为良渚文化，也表现了民族间的融合关系和民族发展的过程。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以及寺洼文化的关系，不仅表现着民族间的相互影响，也表现着民族间的分化过程。在民族交往、融合、分化的过程中，一些部落被另一些部落所同化、融合，在古代历史上是很普遍的现象。而这种情况必然引起语言的兼用和语言的转用。

另外，不同的部落，为了扩大自己的生存领地会不断迁移，这就导致了原始部落之间的冲突。关于这一点，现代考古学和史籍都有大量证明资料。如在我国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五帝”时期，不同族体之间的冲突是频繁的。“黄帝五十五战而天下服”，“太昊七十战而后济”，“少昊之难，四十八战而后济”^②。这些数字虽不能完全确信，但却反映了当时战争频繁的史情。其中见于传说记载的比较大的战争有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颛顼和帝喾与九黎之争、尧伐南蛮于丹水或尧伐驩兜、舜和禹与三

① 林耀华主编：《原始社会史》，第279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太平御览》卷79《帝王世纪》，《路史》，《前记》卷5。